

高铁垃圾袋成“漂流瓶” 让陌生人的善意连接



悄然

“亲爱的陌生人:希望你在2024年天时心,如果不能事事顺心,那就事事尽心。”高铁垃圾袋,正在成为一种很新的“漂流瓶”。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,全国有1.44亿人次通过铁路出行。疾驰的高铁车厢里,一些人从前座背后的口袋里翻出纸质垃圾袋,随机写上心里话,然后原封不动地塞回去,等待下一位旅客。

古老的漂流瓶,承载人们美好的愿望,在航海时代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符号。而今,南来北往的列车中方便乘客的小小垃圾袋,成为当下一种新的“漂流瓶”,亦是契合了某种需求——人们

渴望交流,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翻看网友晒出的垃圾袋,有人写下愿望,有人表达担忧,有人勾画旅途剪影……陌生人之间,穿越时空的交流就在小小垃圾袋上徐徐展开了。这无疑为风驰电掣的高铁旅途中增添了文艺和浪漫气息,在网络时代,“见字如面”的手写图文尤显珍贵,它戳中了人们渴望连接和交流的心,让旅途不再孤单。

正如媒介学者麦克卢汉所言,媒介是人的延伸,一切工具都可以被视为媒介。只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,形式有所不同——从庞贝古城的墙壁到网络时代的留言板,再到如今的高铁垃圾袋,它们其实都扮演了媒介的角色。其之所以成为特定时空的一种流行,正是其满足了彼时人

们渴望对话、交往的基本需求。

而陌生人在文字相接的一刻,似乎突破了时空限制,上一位乘客有了清晰的“模样”,人们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TA的欣喜与迷惘。这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种安慰,让人得以短暂地从现实中抽离。这也是小小垃圾袋,能带给人大大感动的地方。因为偶然“遇见”,因为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与善意,这段旅途也从此变得与众不同。

高铁“漂流瓶”,看似是无意间成了一种新的流行,实际上是特定空间里陌生人的交流潜伏已久,等待第一个勇于提笔之人。于是,“陌生人,我也为你祝福”,又有了新的载体。可以想象,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“漂流瓶”。

结婚“花式负担” 要纳入移风易俗改革

老鹰

近年来,高额彩礼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,部分地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,不少年轻人直言负担不起,结不起婚。除高额彩礼外,漫天要价的“媒婆费”和名目繁多的“上车费”“下车费”“改口费”等,也在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针对高价彩礼问题,从中央到地方,通过部署移风易俗改革,取得一定效果。但不少地方的彩礼仍然少则十几万元,多则几十万元,导致部分恋人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分手,让彩礼归于“礼”任重而道远。实际上,除高额彩礼外,各地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与结婚有关的“花式收费”,加重了农村年轻人的结婚负担。

譬如,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、买车,也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的习俗。就结婚当天而言,除了要承担办酒席的费用,如报道中所披露的,男方还要支付“媒婆费”“上车费”“下车费”“改口费”“盖头费”等费用,总支出不是个小数目。

其中,在一些地方,由于“媒婆费”与彩礼挂钩,也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。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,媒婆抽成就越高。以广东陈女士遭遇为例,媒婆不但要从10.8万元彩礼中抽2.8万元作为媒婆费,还要求男方支付5.8万元的介绍费,这种“吃完女方吃男方”的重复收费,无疑拉高结婚成本,增加结婚负担。

多地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,全国初婚平均年龄正不断后移。国家统计局2022年6月发布的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——2020》显示,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.67岁,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.89岁。如果结婚综合负担过重,一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。

高额彩礼、“花式负担”等因素造成晚婚晚育,不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——家庭造成不良冲击,也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。所以,不管是高额彩礼还是结婚的“花式负担”,都应该全部纳入各地移风易俗改革,以更有力改革“组合拳”,切实减轻年轻人结婚负担。

从目前多地出台的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来看,高额彩礼都是治理的“重头戏”,而对其他与结婚有关的费用支出,少有地方提及。对漫天要价的“媒婆费”,须进行明确限制;对“上车费”等各种索费项目,能废则废,能减则减。

进而言之,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的方案中,应该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拿出详细的涉费清单,对于暂时还不宜废除的涉费项目,要规定收费上限;对“零”收费的有关人员和家庭,应该通报表扬并以多种方式予以嘉奖;对漫天要价的媒婆和有关家庭,不妨拿出相应惩戒措施,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。

年轻人恋爱结婚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,不能让这种好事沾染上铜臭味。无论是高额彩礼还是花式收钱,都破坏了结婚及其仪式的美好。即便彩礼费、“媒婆费”“上车费”等在一些地方属于风俗习惯,但如果过度为之就会阻碍社会进步,该废止的必须废止;即便某些习俗暂时无法废止,也要为其戴上“紧箍咒”。从村规民约到政策法规,都应针对结婚负担重的问题,进一步规范、减负。

开辟新赛道

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,每年贸易量约占全球六成。2023年,中国生产了4883万辆自行车,出口3964.8万辆。

如今,随着低碳理念深入人心,技术水平快速发展,自行车已不仅仅是代步工具,更兼具科技、时尚、社交等多种属性,成为人们绿色生活的一部分。“自行车王国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开辟新赛道。

新华社 徐骏 作

校友卡填职务级别,一场校庆搞得官气十足

任君

近日,有网友发文称,母校内蒙古集宁一中电子校友卡填写信息含个人职务级别,如正国级、副国级、正部级等,并调侃“做梦都不敢这么梦”。之后,集宁一中校友联络处工作人员回应称,职务级别非必填项,不会因职级差异而厚此薄彼,“哪怕是回乡务农,我们都欢迎大家回来。”

每一张“电子校友卡”,确实是个不错的创意。作为母校与校友联系的介质和向导,可以借此回到熟悉或陌生的校园,找到失散多年的老师同学,怀念逝去的青春岁月。然而,一旦把个人职级放在头里,即便是“非必填项”,也给人官

气十足的观感,与校园活动的调性格格不入。

每个同学离开校园,走上社会,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。职务也好、级别也罢,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个体获得的社会认可,本身无可厚非。但在应用这些标签化的职级时,还是要注意场合,不宜作为把校友分为三六九等的依据。

大家反感的或许并非校友的职务级别,而是学校拿职务级别划分圈层的功利化做法。学校教育理应有更丰富、更充盈、更开放的目标。并不是每一个校友都能拼出一个不低的级别,大多数校友只要能做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,学校就可以感到欣慰了,没必要刻意计较校友中出了多

少个高级别官员。

学校搞校庆,如果动辄以级别区分,甚至“捧高踩低”“嫌贫爱富”,会引起校友的失落与反感,从感情上产生疏离和隔膜,从而把校友推得越来越远。

有教无类从来不是说说而已,而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。集宁一中校友联络处人员说,“哪怕是回乡务农,我们都欢迎大家回来”,这话看似平等,实则其透露的价值观也存在问题。培养出有知识的农民,并不丢人。

这些年来,在类似校庆活动中,不时会出现追慕“成功校友”的行为。这也使得一些校庆活动变成了少数人的沙龙,这显然与教育的目标是相悖的,并不可取。